

中产阶级的“利基”杂志 与美国文学的温床

——《纽约客》综述

叶 子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介绍《纽约客》的总体风格与容量,给予数据统计的同时,介绍杂志的主要版块设置与态度立场,并大致梳理杂志中与美国文学相关的重大事件,来说明《纽约客》作为一本中产阶级的“利基”杂志,如何成为美国文学最理想的中介平台。

关键词 《纽约客》 利基杂志 美国文学

叶 子,复旦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系博士生 200433



1925年2月21日,《纽约客》创刊号的封面。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又译《纽约人》)是一本集合了报道、评论、随笔、小说、诗歌与漫画的美国文化类新闻杂志。1925年2月21日,第一期《纽约客》杂志由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 1892-1951)在纽约创刊。之后以每年42期周刊,5期双周刊的速度发行。

一、一本中产阶级的“利基”杂志

在美国偏重文化的主流新闻杂志中,有较为符合大众趣味的一类,比如《时代周刊》(Time)和《新闻周刊》(Newsweek);也有相对小众,被称为“利基杂志”(Niche Magazine)的一类,比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哈泼氏》(Harper's)和《纽约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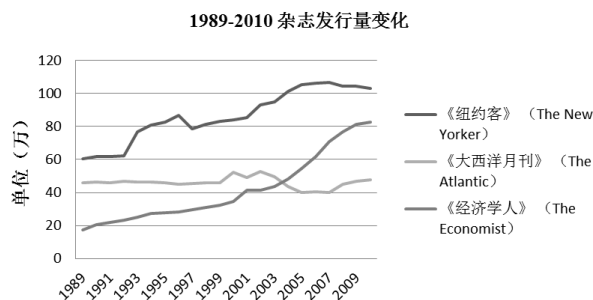
“利基”是商业用语,与“大众”(mass)相对,常见于“利基市场”,“利基营销”等。“利基杂志”的特点,在于利用本身的专长与优势,瞄准某一类型的读者市场。它们是极有针对性,专业性极强的媒体。大众

周刊负责迅速报道,全面覆盖的工作,而“利基杂志”专于补缺缝隙,挖掘深度。在电子阅读时代凶猛到来,出版业销售严重缩水的今天,美国杂志总体趋势不容乐观,大部分刊物利润下滑。以《读者文摘》为例,2010年比之2009年,发行量减少了158万份,下降了22.2个百分点(见表1)。相比之下,“利基杂志”在恶劣的环境中能够较好地生存。从杂志的两个主要指标,发行量(“订阅”加“零售”)与广告收入来看:《纽约客》2010年的发行量为103万份,虽然相对于2009年下降了1.5%,但波动平稳,且发行量始终在“利基”类杂志中排名第一(见表1与表2)。

表1 《纽约客》及其他杂志,2010年与2009年发行量对比^[1]

杂志名	2010年发行量	较之2009年发行量增长量及百分比(%)
《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	533万	减少158万(-22.2%)
《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	449万	减少0.2万(-0.1%)
《人物》(People)	360万	减少1.1万(-0.3%)
《时代周刊》(Time)	331万	减少1.4万(-0.4%)
《时尚》(Cosmopolitan)	291万	减少9.6万(-3.2%)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103万	减少1.5万(-1.4%)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83万	增加1.6万(+2.0%)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48万	增加0.6万(+1.3%)

表2 《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和《经济学人》,1989年至2010年发行量趋势变化图



2009年《纽约客》有1125个广告页面,2010年增长5.5%,上升至1187页^[2]。除去广告部分,杂志创收的主要来源并非靠报刊亭的“零售”收入,而是取决于长期订户的“订阅量”。《纽约客》订户已订阅的平均年数在10年以上。和其他老派杂志的传统一样,订户不但可以提早收阅杂志,还可以享受免邮和折扣的待遇^[3]。但《纽约客》并不廉价,以2012年9月的价格为例,它的单册零售价格高于《时代周刊》1美金(\$5.99/\$4.99),合订价(一年47本)更是两倍于《时代周刊》(一年56本)(见表3)。

表3 2012年9月《纽约客》与《时代周刊》之价格比照

杂志名	单行本		(期数)一年合订价	
	创刊年价格	时价	平均每期价值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1925)\$0.15	\$5.99	(47期)\$59.99	\$1.28
《时代周刊》(Time)	(1923)\$0.15	\$4.99	(56期)\$30	\$0.53

“利基”杂志的存在,是读者市场细分的结果。纸本的阅读方式与“利基杂志”的精神气质较为相符,使《纽约客》能够经受得起电子时代的猛烈冲击。《纽约客》虽然也建立了网络阅读的平台,但与其他杂志的官网相比,显得格外简洁自信。它较少出现视频等与基本阅读无关的板块,大部分文章在全篇阅读时仍然需要付费。它的订户主要集中在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事业成功的人群。据读者群调查统计,《纽约客》的读者家庭平均年收入是9.2万美金,“中值”年收入是15.7万美金,81%的人有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与管理级别人才占64%(见表4)^[4]。

表4 读者群调查^[5]

杂志名	读者家庭平均年收入	读者平均年龄
《时代周刊》(Time)	7.6万	47.3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9.2万	49.4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9.4万	51.6
美国全国平均值	6万	45.4

“利基”一词本有“小众”之意,尽管如此,《纽约客》的小众依然是主流的小众。在杂志建立初期,主编罗斯试图只以高端知识分子作为读者群,很快便发现,单靠上流社会的精英根本无法使杂志盈利。美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罗斯改变方向,使杂志服务于“对上层阶级渴慕”、“自觉聪慧”的中产阶级人群^[6]。这样一个上层偏下中层偏高的定位,使得《纽约客》不用在文化上做妥协,便可充分迅速地扩张自己的销售市场。

如今,《纽约客》的大多数读者已在纽约之外,杂志内容的覆盖面也早已跨越了城市的边界。从1925年创刊至今,《纽约客》的主要版块设置虽没有明显变化,但期与期之间,每个版块之下的栏目内容,有着很大的自由性。常见版块有:始终在杂志开篇出现的“城市活动导刊”(Goings On About Town);“街谈巷议”栏(The Talk of Town),一般由杂志主编撰写热点评论;“通讯”(Reportage)版块,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小事件及人物专访;“评论”栏(The Critic),包括音乐评论、书评(含图书简讯)、剧评和影评等;“小说”栏(Fiction),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节

选,不仅有英语世界的作家作品,偶尔还有其他语类作家小说译文的刊选;以及大量穿插在栏目内容中的“漫画”(Drawings)与“诗歌”(Poems)。在与同类新闻杂志版块设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纽约客》最为偏重“文化”之类目(见表 5)。

表 5 《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与《纽约客》的版块设置对比^[7]

版块类别	《时代周刊》 (Time)	《新闻周刊》 (Newsweek)	《纽约客》 (The New Yorker)
国内事件	29.1%	35.4%	10.1%
工商业界	5.3%	11.1%	3.7%
娱乐/名人	10.4%	8.6%	23%
个人理财	1.5%	0.8%	0%
文化	11.3%	10.2%	22.6%
全球事件	19.5%	20.6%	6.3%

大多同类别的新闻文化杂志拥有更多的男性读者,相比之下《纽约客》的男女读者比例最为均衡(见表 6)。直至战后的二十余年,美国小说界主要的人物几乎都是男性,而《纽约客》在早年间便权衡撰写人的性别比重,仅以“小说”栏为例,在 20 世纪 60 年代女权主义复兴之前,就大量征用女作家来稿^[8]。

表 6 《新闻周刊》、《大西洋月刊》、《经济学人》、《时代周刊》与《纽约客》读者中的男女比例^[9]

杂志名	女性读者比例	男性读者比例
《新闻周刊》(Newsweek)	45%	55%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41%	59%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33%	67%
《时代周刊》(Time)	48%	52%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51%	49%

二、作为美国文学温床的《纽约客》

《纽约客》、《哈泼氏》(发行量 19 万)和《大西洋月刊》(发行量 48 万),是全美对文学影响最大的三本综合文化类杂志。因发行量上的优越,它们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力远远高于任意一本纯文学刊物。这一现象在今天的中国也许是无法想象的。在谈到对文学影响最大的刊物,中国人会想到《收获》和《人民文学》,文学研究者的目光绝少转向与《纽约客》形式类别更为相似的文化新闻刊物,比如《三联生活周刊》,比如《南都周刊》。实际上,文学奖项是对作者、出版业、评论界发展进化中的重要因子。考察《纽约客》与文学奖项的关系,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论证它的影响力。“美国笔会/欧·亨利奖”(The Pen/O Henry Prize)是英语文学界中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奖,每年有二十篇短篇可获此殊荣。历数多年来的获奖小说,总共有 203 篇在《纽约客》上发表,126 篇发表于《哈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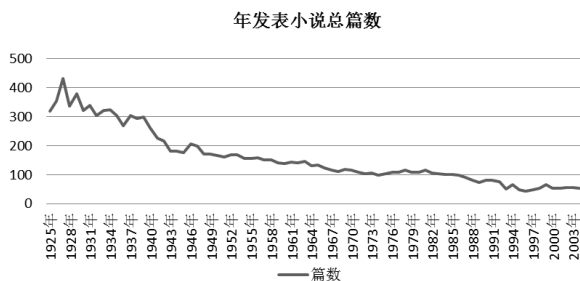
氏》,120 篇发表于《大西洋月刊》^[10]。(见表 7)

表 7 杂志历年刊载之小说获欧·亨利奖情况表

杂志名	刊载作品 获奖篇数	选取阶段
《纽约客》	203	1935-2012
《哈泼氏》	126	1919-2012
《大西洋月刊》	120	1919-2010
纯文学类		
《凯尼恩评论》(The Kenyon Review)	38	1944-2011
《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	24	1957-2011
《犁头》(Ploughshares)	22	1978-2009
《西洋镜》(Zoetrope)	13	1998-2012
《葛底斯堡评论》 (The Gettysburg Review)	12	1990-2001
《铁皮房子》(Tin House)	6	2006-2010
《格兰塔》(Granta)	6	2005-2011
《一种公共空间》(A Public Space)	3	2010-2012

《纽约客》“小说”栏在创刊的第一个十年里(1925-1934),每年发表的小说数量都高达三百篇以上。1927 年是发表小说数量最多的一年,竟有 433 篇之多,平均每期有近十篇小说刊载。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小说发表数维持在一百到两百篇左右。近三十年来,刊载数量不断下滑,到了每期只发表一到两篇的地步(见表 8)。《纽约客》短篇数目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说作为文化的艺术表达形式,能够吸引到的注意力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总体趋势。其他的同类杂志,比如月刊《哈泼氏》,小说专栏固定在每期一篇;而《大西洋月刊》索性取消了小说栏目,只在年终推小说特辑。相比之下,《纽约客》作为一本非纯文学刊物,一年刊发 50 篇左右的小说,配以 50 篇左右的书评及海量的“图书简讯”,依然保持着对当下文学的紧密关注。

表 8 创刊至今,《纽约客》每年发表小说总篇数的趋势图



虽然位居一线的现当代美国作家,几乎都与《纽约客》有过交集,但在杂志创办的前二十年,由于经费不足,初出茅庐的《纽约客》向名声较旺的作家征稿时,并无一般大众杂志所具有的优势。1929 年《斯克莱布诺氏》(The Scribner's)杂志为了连载《告别了,

武器》,总共付给海明威一万六千美金的稿酬^[11]。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纽约客》的零售价仅在15美分一本。1943年,主编罗斯写信给海明威当时的妻子玛莎,感叹杂志创办二十年,却未能与海明威有过重要的合作。罗斯坦言,“早年间没有追着他要稿子,因为我们的稿费微乎其微。”^[12]

事实上,1927年,刚刚出版《太阳照常升起》的海明威,戏仿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情色自传《我的生活与爱情》(My Life and Lovers)的第二卷,写作了微型短文《我自己的生活》(“My Own Life”)^[13],后者遭遇了《斯克莱布诺氏》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退稿,转而投给《纽约客》,嫁接了海明威在世时与《纽约客》唯一成功的合作。

《我自己的生活》一页不到却分作四小段,“我如何与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决裂”、“我与格特鲁德·斯坦因决裂的真实故事”、“我如何与我的孩子们决裂”以及“我如何与本奇利(Benchley)决裂”。在现实生活中,刺杀林肯的布思死于1865年,与海明威未有过交集;1927年时海明威的大儿子四岁,另外两个儿子还未出世,而他与《纽约客》御用讽刺作家本奇利也并不相识。海明威在已十分局促的篇幅中,将他与斯坦因友谊出现的裂痕,搅入另外三段荒谬随机的虚构故事中去。在与斯坦因的“决裂故事”中,海明威强调故事的“真(true)”与“真实(real)”:

我想和斯坦因小姐讨论文学。“我试着模仿你的风格,斯坦因小姐”,某个雨天下午我说道,“我想像你,像亨利·詹姆斯,像《旧约》,还有,”我补充道,“像伟大的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一样写作。”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一个样。”斯坦因小姐说道。坦白说,我挺受伤。^[14]

他拜访斯坦因而屡遭闭门羹,甚至被女仆用自行车打气筒追赶,最后斯坦因将家门钉死,并亲笔写了“呆在外面——说的就是你!”的警告牌。海明威用低俗闹剧的笔法,写作了自己与斯坦因间的角力。世人皆知,正是斯坦因定义了“迷惘的一代”,将海明威引入文学界。而这篇颇不起眼,极易被错过的讽刺小品文,却展现了文学史中不为人知的立面。或许,对于斯坦因给自己作品的定义与标签,海明威本人并不满意。这段真假难辨的倾诉,接连被两本主流杂志拒绝。它最终被《纽约客》吸收,其中有历史的偶然性,也从侧面论证了《纽约客》在创办初期所树立的文字

风尚观。

“这世界喜幽默,待它却轻薄。它给严肃艺术家桂冠,对诙谐的人芽甘蓝。”^[15]这是《纽约客》资深编辑E.B.怀特^[16]的名言,他认为世人怠慢了有趣的文字。上世纪前半叶,《纽约客》并不以严肃文学为重头戏,而是主攻趣文,有意发展并壮大“幽默文学”的文类,为作者塑造了幽默家(Humorist)的另一重身份。它不按虚构的程度为作品分类,模糊了“小说”与“散文”的边界,使得作者们有机会以一种半虚半实的方式,有利可图的放矢地与“真相”嬉戏,带给文字张力与热度。在海明威戏仿的作品发表之后,又不断出现了戏仿海明威的篇章^[17]。主编罗斯广撒英雄帖,他写信给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我向上帝许愿,希望你可以再为我们写点。这样你固然发不了财,但一定会给你带来些成就感。”^[18]菲茨杰拉德一生为《纽约客》投稿了两首短诗及两部戏仿小文。1929年的《一部自传》(“A Short Autobiography”)^[19]通过罗列作者在禁酒令时代的饮酒记录,讲述生活点滴,也是一页不到的极短篇幅。1937年《一本属于自己的书》(“A Book of One's Own”)^[20]是一篇调侃图书出版业“简明风”与“压缩版”的小文章。

这些诗歌或小品文,其中过于草图或片段式的书写,难免有敷衍之嫌。《纽约客》在名家稿件的处理上,并非完全不做挑选。1936年,如日中天的菲茨杰拉德写作的微型短篇《谢谢你的火》(“Thank You for the Light”)便遭受了《纽约客》的退稿。编辑写给代理人的退稿函如下:

抱歉我们觉得这篇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完全无法发表。在我们看来,它太吊诡了,一点也不像他的风格,实在过于古怪。当然,我们极希望能有一篇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故事,希望你能发给我们一些更为合适的篇目。无论如何,要谢谢你让我们有阅读它的机会。^[21]

在这篇当年被视为过于吊诡的小说中,风韵犹存的寡妇汉森太太,是紧身胸衣和束腰带的旅行推销员。嗜烟如命的她在保守的密苏里州居然找不到能抽口烟的地方。无奈之下,她走进了一所天主教堂。当司事熄灭最后一支蜡烛后,汉森太太发现自己忘了带火柴。疲惫不堪的她在圣母玛利亚的神像下睡着了,从长椅上醒来时,却发现手指间的烟被点燃。小说对于圣母玛利亚的处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显然颇不适宜。两千字的小短篇并不处理漫长的心理叙述,没有情节变调,但却以一种恰如其分的节奏,达到并呈现出所谓的“最后一幕”(Final Scene),不失为某一时刻速写的范文。2012年,这篇从未见天日的“小小说”重新在《纽约客》发表。

历数创刊至今,诸位名家与《纽约客》间相互接纳、引介与博弈的种种经历,或许能较好地呈现出这本杂志在英语文学史上举重若轻的地位。四十年代,凭靠发行量及大量的高端广告商,《纽约客》的稿费从之前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成功上升为全美最高。1942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移居美国两年后,在埃德蒙·威尔逊^[22]的介绍下,发表了一首名为《文学晚宴》(“Literary Dinner”)^[23]短诗。在这首诗中,“我”在晚宴上吃掉了自命不凡的“詹姆斯博士”,“最好吃的部分是他坚果味香脆的小脑。心脏看上去像一粒闪闪发光的褐色大枣。”狂妄的想象力中,纳博科夫联觉通感的能力已崭露头角。1948年至1950年期间,9篇他的系列自传体散文被作为虚构类作品收入“小说”栏^[24]。1951年,罗斯在与纳博科夫的私人通信中吐露,“你谈到‘某些意料之外的因素’可能会阻碍文章的发表。我认为不存在与文章无关的那些外部因素,除非丢了颗原子弹把我们弄倒闭了。”^[25]“小说”栏在1953年到1955年间,分四次节选了《普宁》(Pnin)^[26]。直至今日,纳博科夫的小说和私人书信依然不断被《纽约客》重新摘录。

行文轻快的约翰·契弗自19岁起就在《纽约客》上撰写评论,1931至1981年间,发表小说、评论、诗歌共计126篇。1947年,他最著名的短篇《巨型收音机》(“The Enormous Radio”)投稿《纽约客》后,罗斯亲自回信称“那篇小说值得再好好修改。它会成为一篇让人难忘的小说”^[27]。同年5月17日,稍作修改的《巨型收音机》在“小说”栏目发表^[28]。1976年,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契弗回忆,罗斯习惯于对手稿大量地提问,他的编辑风格让作者们又爱又怕,他对《巨型收音机》作出了几处中肯的细节修改,比如将“卖掉它,我们能换个几元(dollars)钱用”改为“换个几块(bucks)钱用”,比如将“广播轻柔地传来”中“轻柔地”叠用^[29]。契弗去世后,1990至1991年间,《纽约客》又分六次刊载了他的日记,并在2000年年度刊庆时,重新摘录著名短篇《再见了,我的弟弟》(“Goodbye, My Brother”,1951)中的片段,重温契弗的文学记忆^[30]。

杜鲁门·卡波特曾就职于《纽约客》。1944年9

月,有人写信给罗斯,称有位叫卡波特的男同性恋者大闹笔会,并自吹是《纽约客》“街谈巷议”栏目的作者。罗斯公开作出澄清,指出卡波特是战时男劳力短缺而招入编辑部的勤杂工,并表示《纽约客》不能为这位年轻人的行为负责^[31]。实际上,同年4月和7月,卡波特确实两次在“街谈巷议”栏目撰文,虽然只是极不起眼的豆腐块文章^[32]。之后,他不断给《纽约客》投稿,又不断遭拒。1949年,罗斯联系到卡波特的代理人,希望发表一些他“不那么心理病态的作品”^[33]。卡波特很快证明自己不是一般的作者。凭靠冷静客观、细节真实准确的《倾听缪斯》(The Muses Are Heard,1956),卡波特已转变为一个最具有《纽约客》风格的写实记者。1965年的《冷血》(In Cold Blood)分四次在《纽约客》“犯罪年鉴”(Annals of Crime)栏连载^[34]。直至1979年,他在《纽约客》发表了12篇随笔与通讯稿。

1946年,J.D.塞林格还未写作《麦田的守望者》,当短篇《冲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Slight Rebellion off Madison”)^[35]被《纽约客》录用时,他欣喜若狂,因为“看到自己的作品在《纽约客》上发表之时,他才最终相信他已经成功地当上了作家”^[36]。1947年,《纽约客》接到塞林格的投稿《香蕉鱼的绝佳日子》(“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37]时,决定授予他“第一拒稿权”的合同:杂志每年预付几百美元的定金,以保证塞林格的短篇能够先投给《纽约客》,被《纽约客》拒用后,方可投向别处。塞林格很快决定,他只想在《纽约客》上发表,即使退稿不能发表他处也在所不惜。1946年至1965年间,他总共在《纽约客》发表了13篇小说。著名的《弗兰妮》(“Franny”)和《祖伊》(“Zooney”)都是先在《纽约客》上发表后再编撰成集^[38]。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黑人小说家詹姆斯·鲍德温1962年讨论种族问题的随笔《从我意识中某区域的来信》(“Letter from a Region in My Mind”),正是在《纽约客》初次发表时引起轰动,打破了当时美国社会不可言说的种族与阶级的界限,从而树立了他“少数族裔作家”的标杆^[39],笔耕不辍,文体华美的约翰·厄普代克,从1954年一直到逝世前,不断为《纽约客》撰文,半个多世纪中发表了近900篇诗歌、小说与书评。菲利普·罗斯1958年至2005年间,在《纽约客》上发表了12篇小说与评论。他凭借短篇小说集《再见吧,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1959)崭露头角,其中的《信仰的维护者》(“Defender of the Faith”)

最先正是在《纽约客》“小说”栏发表^[40]。

实际上,小说栏目的几代编辑人,也经历了风格上的巨大转变。最能代表《纽约客》文字风格的老编辑们,从E.B.怀特、到沃尔柯特·吉布斯^[41]、到威廉姆·麦克斯威尔^[42],再到罗杰·安吉尔^[43],皆能身兼二职,既是作家,也是编辑。到了近期的比尔·布福特^[44]和黛博拉·特雷斯曼^[45]等人,编辑模式变得更为精准集中,所选择的作者作品也与图书出版业更为紧密地相连。

1999年6月21日《纽约客》在“夏日小说特辑”(Special Summer Fiction Issue)中,收入了二十位“美国今日最佳青年小说家”的二十部短篇。《纽约客》自创刊以来,即便在“小说特辑”中,也从未出现如此庞大的作品数量。对于如何评定“最佳”,如何划分“青年”与“中年”,布福特在“评论”栏以《先读为快》(“Reading Ahead”)为题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布福特称此次评选将“青年”的年龄界点定为“四十岁”,这二十位50年代末至1970年前出生的作家,既包括在当时“最有成就”,已颇有声名的青年作家,也引入了“最有前景”,正不断获得认可的新鲜作者。他在千禧来临之际,如此谈论20世纪的小说:

(20世纪的)小说不再举足轻重。所有艺术形式都经历了这一世纪耳熟能详的各种变革,而小说的命运很可能是其中最动荡的。它被政治化,现代化,后现代化,后后现代化,解构,重构。正是在本世纪,小说以平装廉价本出版,大量销售,低俗化,奥普拉化。它放弃叙述,模仿思想,放弃思想,模仿无形的思想,再放弃无形的思想,重拾形式。它筋疲力尽,死去,又觉醒。它被博尔赫斯压扁,被格拉斯吹大,被卡尔维诺重塑成型,最后停下来伫立在另一个世纪的前夜。那眼下的我们发现了什么?一个让人惊讶的结果:一代人像烟火般夺目地,从容自在地写作小说。^[46]

《纽约客》孜孜不倦地忠实记录这些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种种变化,力图做到完整,纯粹的“纽约客”之声变得愈来愈多元化。“小说”栏不再只局限于刊登美国文学的精华,甚至有了世界文学的样貌。近十年间,仅中文作品来说,便有了高行健、马建和莫言的译文发表。《纽约客》正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的交流平台。2010年6月14日《纽约客》继续了11年前“名单游戏”,评选了美国文学界最有前途的“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作者”(20 Under 40)，“小说”栏目编辑认

为,他们代表了“今日美国第一流小说中最显眼的创造性与活力”:

今天在这个国家里写成的小说,不一定以这个国家为背景,作者也不一定出生在此。尽管我们名单中所有非本地作者都已在北美地区定居——有些儿时就来搬到这里,有些成年后来到美国——他们国别的多样性却是惊人的:尼日利亚(阿迪奇埃),秘鲁(阿拉尔孔),拉脱维亚(贝泽摩吉斯),中国(李翊云),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南斯拉夫(奥布雷特)和俄罗斯(施特恩加特)……所有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不仅是对语言与叙事的精通,还有其中不难觉察到的野心。这些作家并非都是颠覆传统之人;其中一些有意在现传统之下写作。但他们都以卓越为目标:在这个已被文字,声音,和图像淹没的文化中,努力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维持住这样的关注,努力地给予我们惊喜,娱乐,教化,并感动我们,及后续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们。^[47]

令人更为欣喜的是,新一轮的名单中出现了华裔文学新秀李翊云的名字。这一次《纽约客》变化了自己的筛选方式,为美国文学的未来谱写了一幅多国别多文化的蓝图。

《纽约客》“小说”的发展线索,最特别之处,在于它拥有主体性的双重“在场”:既有小说书写者的主体创作,又体现编辑部的文化视野。在这条线索中,《纽约客》不是简单透明的文化中介渠道,而是作为一个挑选者与编辑者,有意识有目的地介绍与评论,有指向性地书写和编排,不断激活并“延宕”与文学有关的想象。两种“在场”的“合谋”成就了一种极其有影响力的表现方式。由于两者的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都有变化波动,这一“合谋”的行为并没有一种稳固不变的模式。它们在与彼此的互动中沉浮周转,使得文化历史局部中特殊的个体性差别得以展现明晰。这些文本被《纽约客》或“采纳”或“批判”之后,才以较为完整的面貌呈现。即便两者最终呈现出一个“合作与对话”的样貌,但跨越差异不断面临选择的《纽约客》,在“合谋”中明显处于主导的权力地位,是更为重要的“在场”。它坚持“自由主义”的文化策略,对任何文学文本都敢于拒绝或承认。作家文本的叙事目标与态度,却固定在《纽约客》的基调之上,不断呈现、打散、再拼合,这一点在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剑桥美国文学史》称《纽约客》是“从风俗小说

(The Novel of Manners) 衍生出来的周刊……一向以它对生活持一种轻浮、欢快的看法而出名”^[48]。近九十年的杂志传统,赋予《纽约客》一种特有的语态与吐露方式:它发自高级知识分子,在洞察力上相仿,在表达上偏好一致。《纽约客》的编辑自视为公共文化的筛选者,自信用其较好的审美口味能够影响并提高读者的文化标准,为同辈提供一种文化商品的展示服务。《纽约客》不仅在整体上改变了“今日美国”的风格与容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新闻体,建立了幽默与漫画艺术新的标准模式,连带产出了大量的社会文化的活动。它是一本能够展现文化上和政治上全异元素融合的综合性杂志,没有明显偏左或偏右的立场,自有一种透明度和普遍性,为美国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定调。随着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印刷书籍,曾经普世的文学似乎将面临终结,但《纽约客》信心十足地为美国文学未来一代的小说生产者,勾勒出一个个体的轮廓与印象,试图对“文学将死乎”的问题作出回应。它通过自身包容多元的影响平台,力求文学可以继续永恒地普世下去。

注释

[1][2] 数据来源 <http://stateofthemediamedia.org/>,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FAS-FAX reports for consumer magazines, 2010.

[3]数据来源 <http://stateofthemediamedia.org/>, MRI Doublebase, 2011.

[4]数据来源 <http://stateofthemediamedia.org/>, MMR data, 2011.

[5][9] 数据来源 <http://stateofthemediamedia.org/>, Mediamark research, Magazine Pocketpiece, 2011.

[6]Mary F.Corey, The World through a Monocle: The New Yorker at Mid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

[7] 数据来源 <http://stateofthemediamedia.org/>, Hall's Media Research, Unpublished Data, 2011.

[8]项美丽(Emily Hahn, 1905-1997)在 1928 年 1996 年间,共在《纽约客》发表了 200 篇以上的小说和通讯稿;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 1917-1967)1941 至 1942 年间,有 3 篇小说在《纽约客》上发表;尤多拉·威尔蒂(Eudora Welty, 1909-2001)1949 至 1969 年间,有 9 篇小说与诗歌发表;琼·斯塔福德(Jean Stafford, 1915-1979)在 1948 至 1978 年间,有 27 篇小说发表;霍腾斯·卡利(Hortense Calisher, 1911-2009)在 1948 至 1956 年间,有 9 篇小说发表;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1916-1965)在 1943 至 1953 年间,有 12 篇小说与诗歌发表。

[10]来源 欧·亨利奖官方网站。<http://www.randomhouse.com/anchor/ohenry/magnot.html>.

[11]“Letters: Ernest Hemingway and Maxwell Perkins: Three Words”, The New Yorker, July 24, 1999. pp.73-77.

[12]Ed. Thomas Kunkel, “To Martha Gellhorn”, Letter From the Editor: The New Yorker's Harold Ross, New York: Random, 2000. pp.204-205.

[13][14]Ernest Hemingway, “Fiction: My Own Life”, The New Yorker, February 12, 1927. pp.23-24, p.23.

[15]E.B. White, “Some Remarks on Humor”, Essays of E.B. White,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9. p.244.

[16]E.B. 怀特(E.B White, 1899-1985)《纽约客》的创刊元老,1925 年 1976 年间为杂志撰写一千八百多篇评论。

[17]比如同年的圣诞节特辑,另一位《纽约客》的幽默作者詹姆斯·瑟伯(1894-1961)戏仿海明威的文字,写作《圣·尼古拉斯(圣诞老人)来访:用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写法》一文。James Thurber, “A Visit From Saint Nicholas in the Ernest Hemingway Manner”,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14, 1927. pp.17-18.

[18]Ed. Thomas Kunkel, “To F. Scott Fitzgerald: April 26, 1929”, Letter From the Editor: The New Yorker's Harold Ross, New York: Random, 2000. p.42.

[19]F. Scott Fitzgerald, “Fiction: A Short Autobiography”, The New Yorker, May 25, 1929. pp.22-23.

[20]F. Scott Fitzgerald, “Fiction: A Book of One's Own”, The New Yorker, August 21, 1937. p.19.

[21]“The New Yorker Out Loud: A Rediscovered F. Scott Fitzgerald Story”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books/2012/08/new-yorker-out-loud-a-re-discovered-f-scott-fitzgerald-story.html#ixzz2L23XM0D9>.

[22]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曾任《名利场》的主编,后又担任《新共和》的副主编,长期为《纽约客》及《纽约书评》做图书评论员,被韦勒克称为“唯一在欧洲最为知名和读者最多的美国批评家”,在美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一代文豪,一位首席社会评论家”。参见[美]雷纳·韦勒克著 杨自伍译,《第六卷·美国批评1900-1950》,《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0 页。

[23]Vladimir Nabokov, “Literary Dinner”, The New Yorker, April 11, 1942, p.18.

[24]这些散文 1951 年结集出版,取名为《真凭实据》(Conclusive Evidence),成为纳博科夫最早版本的自传。经过修改之后,在 1967 年又以《说吧,记忆》(Speak, Memory)为题作为修改版的自传重新出版。

[25]Ed. Thomas Kunkel, “To Vladimir Nabokov”, Letter From the Editor: The New Yorker's Harold Ross, New York: Random, 2000. pp.402-403.

[26]Vladimir Nabokov, “Pnin”,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28, 1953, pp.42-48.; “Pnin's Day”, The New Yorker, April 23, 1955. pp.31-38; “Victor Meets Pnin”,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5, 1955. pp.38-45; “Pnin Gives a Party”,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2, 1955. pp.46-54.

[27][31]Ed. Thomas Kunkel, “To John Cheever”, Letter From the Editor: The New Yorker's Harold Ross, New York: Random,

2000. p.308, pp.242-243.

[28]John Cheever, "Fiction: The Enormous Radio", The New Yorker, May 17, 1947, pp.28-33.

[29]Annette Grant, "Interviews: John Cheever", The Paris Review, Fall 1976, No. 67.

[30]John Cheever, "Journals: I-From the Late Forties and the Fifties", The New Yorker, August 06, 1990, pp.33-64; "Journals: I-I-From the Late Forties and the Fifties.", The New Yorker, August 13, 1990, pp.29-61; "Journals: I- From the Sixties", The New Yorker, January 21, 1991, pp.28-63. "Journals: I-From the Seventies and Early Eighties.", The New Yorker, August 12, 1991, pp.26-51; "Journals: II-From the Seventies and Early Eighties.", The New Yorker, August 19, 1991, pp.26-56; John Cheever, "Takes: Good-bye, My Brother", The New Yorker, February 21, 2000, p.237.

[32]Truman Capote, "The Talk of Town: Poem", The New Yorker, May 20, 1944, p.22; "The Talk of Town: Dancing Again", The New Yorker, July 15, 1944, pp.15-16.

[33]Ed. Thomas Kunkel, "Memo to Gus Lobrano", Letter From the Editor: The New Yorker's Harold Ross, New York: Random, 2000, p.369.

[34]Truman Capote, "Annals of Crime: I-The Last to See Them Alive",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5, 1965, pp.57-166; "Annals of Crime: II-Persons Unknown", The New Yorker, October 2, 1965, pp.57-175; "Annals of Crime: III-Answers", The New Yorker, October 9, 1965, pp.58-183; "Annals of Crime: IV-The Corner",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6, 1965, pp.62-193.

[35]J.D. Salinger, "Fiction: Slight Rebellion off Madison",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21, 1946. pp.82-84.

[36][美]保罗·亚历山大著,孙仲旭译《塞林格传》[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37]J.D. Salinger, "Fiction: 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 The New Yorker, January 31, 1948. pp.21-25.

[38]J.D. Salinger, "Fiction: Franny", The New Yorker, January 29, 1955, pp.24-43; "Fiction: Zooey", The New Yorker, May 4, 1957, pp.32-139.

[39]James Baldwin, "Letter from a Region in My Mind",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7, 1962, pp. 59-144.

[40]Philip Roth, "Fiction: Defender of the Faith", The New Yorker, March 14, 1959, pp. 44-66.

[41]沃尔柯特·吉布斯(Wolcott Gibbs, 1902-1958)1927年即进入《纽约客》编辑部。

[42]威廉姆·麦克斯威尔(William Maxwell, 1908-2000) 1936年至1975年间担任《纽约客》“小说”栏目编辑。

[43]罗杰·安吉尔(Roger Angell, 1920-) 1956起成为《纽约客》编辑,曾任“小说”栏目主编。

[44]比尔·布福特(Bill Buford, 1954-) 1995年至今担任《纽约客》“小说”栏目编辑。

[45]黛博拉·特雷斯曼(Deborah Treisman)2003年起成为《纽约客》“小说”栏目编辑。

[46]Bill Buford, "The Talk of the Town: Comment", The New Yorker, June 21, 1999. pp.67-68. 在1999年《纽约客》对于“美国小说之未来”(The Future of American Fiction)作出预言之后,名单中的作者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 1959-)以《纠正》(The Corrections, 2001)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 1960-)的《中性》(Middlesex, 2002), 麦可·谢朋(Michael Chabon, 1963-)的《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Kavalier & Clay, 2000), 朱诺·迪亚兹(Junot Diaz, 1968-)的《奥斯卡·哇塞——短暂奇妙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2007) 分别斩获三届普利策文学奖。其中两位亚裔作者,孟加拉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 1967-)凭借《疾病解说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 1999)畅销上百万册,也荣获普利策奖;韩裔李昌来(Chang-rae Lee, 1965-)的《投降》(The Surrendered, 2010)获普利策奖提名。

[47]The Editors, "The Talk of the Town: Comment", The New Yorker, June 14, 2010. pp.49-50.

[48][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孙宏主译《第七卷·散文作品,1940年-1999年》《剑桥美国文学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责任编辑:平 啸]

A Middle-Class "Niche" Magazine and the Hotbed of American Literatur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Ye Zi

Abstract: This essay introduces the overall style and content of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with emphasis on the setup of different column sections and the Magazine's main attitudes and positions. It sorts out the major even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magazine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to show how The New Yorker, as a "Niche" magazine for middle-class Americans, becomes the most ideal intermediary platform for American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New Yorker; Niche Magazine; American Literature